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福樂智慧

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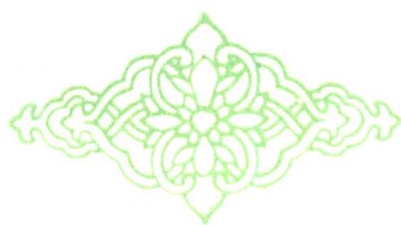
44.916

233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著

福樂智慧

郝关中 张宏超 刘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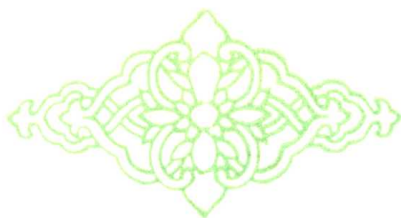


民族出版社

3548

يوسۇپ خاس ھاجىپ

قوتارغۇبىلىك



مىللىيەتلىك رىئەسەتچىلىك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著

福 乐 智 慧

郝关中 张宏超 刘宾 译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8 字数:700千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定价: 7.00元

书号: 10049·17

译者序

《福乐智慧》(Kutadqu Bilik)是公元十一世纪我国历史上喀拉汗朝^①时期用回鹘语(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一部长诗。这部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名著,十九世纪以来即为研究中亚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文化的中外学者所注目,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

长诗经后人校勘、整理,计存一万三千二百九十行,由八十五章正文和三个附篇组成。另有两篇序言。长诗作者为巴拉萨衮^②人优素甫(Yusuf)。作品成书于回历462年(公元1069/1070年),作者把它献给了当时喀什噶尔的执政者、东部王朝副可汗“桃花石·布格拉汗”^③,并因此荣膺“哈斯·哈吉甫”(Has Hajib)(御前侍臣)的称号。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杰出代表作。我国已故著名作家老舍在五十年代谈到这部作品时曾经指出,“它不仅是维吾尔族的宝贵遗产,同样也是构成祖国文化历史的宝贵财富”^④。维吾尔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不仅有杰出的作家(如贯云石等)直接参与了古代汉文学的发展过程,在汉文学史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且,更以其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为祖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福乐智慧》以其集中概括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深刻内容、深闡博引的丰富哲理、优美典雅的诗艺和熔本民族传统与多种外来文化于一炉的开放格调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中亚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公元744年（唐天宝三年），回纥部联合葛逻禄等部推翻了后突厥汗国，建立了与唐朝有密切关系的回纥汗国。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所灭。回鹘诸部于是大规模迁入西域，与当地原有回纥游牧部属和土著居民融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十世纪到十一世纪，我国出现了与宋王朝并存的几个政权：诸如北方契丹人的政权；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吐蕃人政权；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政权；吐鲁番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高昌回鹘政权以及从库车西部到布哈拉、从伊赛克湖到和田的喀拉汗朝政权等。初以巴拉萨衮、后以喀什噶尔为王都的喀拉汗朝政权，是古代维吾尔人参与建立的一个王朝，在整个中亚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福乐智慧》的产生，标志着维吾尔族文化史上漠北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新时期的开始，鲜明地体现了自漠北时期便开始形成的自身文化传统在新条件下的延续、丰富和发展。

回鹘西迁以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喀拉汗朝时期，农业、手工业已发展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部分，定居和城市化也普及了起来。喀什噶尔、巴尔楚克（巴楚）、巴拉萨衮，讹塔拉、法拉甫、撒马耳罕以及类似的大的经济、商业和文化中心，也都出现了。

喀什噶尔在喀拉汗王朝存在的整个时期，始终保持着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随着城市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封建所有制关系的发展，以喀什噶尔、巴拉萨衮、撒马耳罕等城市为中心的城市文化出现了高涨局面。具有悠久历史的维吾尔民族传统文化，在吸收了祖国中原文化和阿拉伯文明的优秀

因素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喀拉汗朝境域内，产生了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等一批杰出的学者、思想家和诗人。在东部佛教徒的高昌回鹘王国中，出现了僧古萨里都统等著名的翻译家。在这一时期，回鹘人的文化模式在同一层次上表现为喀拉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两种不同类型。以文学而言，喀拉汗朝的文学由于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从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中吸收了较多的营养；而高昌回鹘文学则接受了佛教和摩尼教影响，汉文化的痕迹更为鲜明。但是，这两种类型的文学具有共同的来源和共同的传统，使用共同的语言，在漠北时期都曾接受过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同一的文化心理特征。因此，这两部分文学仍旧是同一民族的文学。

《福乐智慧》便是在这种新型文化模式的土壤中孕育而成的。

(二)

有关《福乐智慧》的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生平，无论是汉文史籍和阿拉伯—波斯文史料中均无记载。十二世纪的书志学家萨曼尼·阿布·赛义德在《Kitab-al-Sansab》一书中曾用两页的篇幅提到了包括十一世纪喀什噶尔的作家在内的一批著述者，却无一字涉及《福乐智慧》的作者。目前有关优素甫生平的资料全都来自《福乐智慧》一书中的零星记载，主要是来自正文之首的散文体和诗体两篇序言^⑤。

根据一些诗句的记载并由此推断，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出身于虎思斡耳朵^⑥的名门，乃“虔诚信士”。作者生年约为1018年或1019年，卒年不详。《福乐智慧》的写作用了十八个月，“在巴拉萨衮开始命笔，1068年到喀什噶尔后继续写作，于1069年完成”^⑦。

《福乐智慧》是用回鹘语写成的。在喀拉汗朝及其前后的时期，回鹘语是中亚主要的交际工具和官方语言，是喀拉汗朝的国语。这一时期的回鹘语在一些文献中被称做“哈卡尼亚语”（即王朝语或可汗语）。⑥

《福乐智慧》原名“Kutadqu Bilik”，意为“赋予（人）幸福的知识”。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个书名，沿用了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冯家升教授拟定的译名⑦。在《福乐智慧》第十一章里，作者专门阐释了书名的含义和他在书中塑造的四个人物形象的寓意。作者所说的那些“为读者引路，导向幸福”的知识，即是通过这四个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大量对话展现出来。

国王日出，象征着公正和法度；大臣月圆，代表了幸运；月圆的继任者贤明是智慧的化身；而修道士觉醒，则象征着“知足”或“来世”⑧。

长诗的框架按照在伊斯兰古典时期的文学中曾一度流行的模式结构而成，进入主要情节的节奏相当缓慢。前十一章与本书的主要情节无关。对真主、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四同伴的赞颂，对春天和喀什噶尔执政者布格拉汗的赞颂，论七曜和黄道十二宫，论知识和智慧，论语言，对善行的歌颂，以及对书名含意和作者暮年的叙述等内容占据了397个双行。故事情节从第十二章才开始展开，到第八十五章结束。最后三个附篇则为作者直抒胸臆的抒情诗。《附篇之三》相当于全书的“跋”或“后记”。

长诗的情节并不复杂，主要通过上述四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间的对话，表达了作者对社会、法度、伦理道德、哲学、治国之道等问题的看法。把哲理性的对话有机地结构在一起的，是如下的故事：

国王日出励精图治，一心求贤。月圆慕名前来求见，以图报效国家，深得国王信任，出任大臣多年。月圆辞世时向日出托付其

幼子贤明，贤明得国王恩遇而承袭父职。贤明有一宗亲名曰觉醒，人品高洁，日出王欲召其出仕，与贤明共为辅弼。然而，此人奉行遁世主义，潜隐山林苦修，虽经贤明奉旨三次敦请，始终不肯应诏出仕。时光流逝，贤明亦产生了遁世苦修之念，觉醒却劝其忠心报效日出国王。不久，觉醒罹疾，卧床不起，贤明前往探视。觉醒死后日出王和贤明深感悲戚，对其高洁人品缅怀不已。此后，贤明秉政益加勤勉，天下遂乃大治，云云。

显然这个简单的情节并非取材于历史或传说，也不带任何传奇色彩。有些研究者关于《福乐智慧》是喀拉汗朝现实的反映、书中表述的理想是建立在作者个人的经历之上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他们认为，日出国王就是桃花石·布格拉汗。月圆就是优素甫自己。月圆长途跋涉，投奔日出，侍奉国王的经历，显然就是优素甫自己的写照。对于这一形象，作者是满怀深情去着意刻划的。而贤明可能就是优素甫之子的形象。他在作品后半部流露的厌弃人生、遁世修行的念头，同作品最后的《附篇之一》中所反映的作者自己的消极感伤情调也十分吻合^①。

如果我们把这部长诗在内涵构成上分为三个层次，不难依次获得对长诗思想内容的步步深入的认识。

第一个层次是社会生活形态，即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和反映。这部分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月圆、贤明、特别是觉醒对国王日出的劝谏和最后作者的《附篇之二》当中。通过这部分内容，读者能够获得对喀拉汗朝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生动印象：如它的政权结构、经济生活、社会阶层以及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与中原和其它地区的关系；宗教在世俗生活中的影响；社会礼俗、妇女地位；特别是占有相当篇幅的对社会矛盾的大胆揭露。这些，都为我们深入研究喀拉汗朝历史和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人物形象所表达的自然观、人生观、社会

意识和历史意识。做为作品中的表述，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自己的思想观念的结晶，但在实际上同时也是喀拉汗朝时期维吾尔人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品内涵的第三个层次，我们将接触到作品所体现的文化背景问题。这是在探讨这一作品内容时最为复杂、同时又最引人入胜的问题。凭借作品本身提供的大量证据，我们可以概括出这种背景的几个最基本的特征：

第一，回鹘文化意识和传统，在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作者奉为圭臬、广征博引的许多民间格言、谚语以及属于草原贵族人士的名言，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回鹘部属固有的文化意识和传统观念。《福乐智慧》和与它同时代的另一部古代维吾尔人的学术名著《突厥语词典》，同被研究者们认为是那一时代面临阿拉伯文化的挑战而坚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典范，绝非偶然。《福乐智慧》一书约有6000余个根词和派生词，其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仅只500个左右。作品中的某些天文学名词和哲学抽象名词，均采用突厥语词语，如“室女座”被称为“麦穗座”（Buqday Baxī）。这与当时在中亚其它地区，阿拉伯语成为通行的学术语言，波斯语成为规范的文学语言的情况适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作品体现了祖国中原汉文化与回鹘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国外有研究者认为，整个喀拉汗朝，是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的^②。作品中的散文体序言则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③，从而明确表明了它同祖国中原文化的内在密切联系^④。我们确信，细心研读此书的读者倘以此与我国古代各派思想潮流进行对比研究，将会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这种同祖国文化的一致性亲缘关系，在作品的思想内涵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第三，作品吸收了外来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自身进一

步得到丰富与充实。这里主要指的是由包括阿拉伯传统文化在内的世界多种文化的精萃汇集而成的阿拉伯文明的影响。在作品第四章中，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形成这种文化汇集现象的历史和地理条件：“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你瞧，从空中飞来天国的鸟儿，一些是印度的罗阇，一些是凯撒的使臣”；“有的从东方带来珍贵的礼品，有的从西方赶来，献一片赤心”。正是在当时这种体现开放格局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中，阿拉伯文明在宗教、语言、文学等许多方面，都给喀拉汗朝的维吾尔文化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作品中引用的一部分历史和传说典故、某些文学描写手法和形式都是这种影响的表现。

(三)

《福乐智慧》一书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

《福乐智慧》是中世纪维吾尔诗歌的典范作品。它的产生，充分说明十一世纪时，维吾尔书面文学中的诗歌创作就已经达到了相当娴熟、高超的水平。《福乐智慧》使用的诗体是就今天而言亦属难度极大的古典诗律中的阿鲁孜韵律（Arūz Wāzni）的木塔卡里甫格式（Mutaḳarip）和玛斯纳维（Māsnawī）体。

这种极为严格的整齐划一的要求，显然会给使用回鹘语的《福乐智慧》这样大型作品的创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纵观全书，犹如一气呵成，很少有斧凿痕迹。这不能不使人惊叹作者的功力之深。

在《福乐智慧》中作者还掺有一些被称为“柔巴依”（鲁拜体）的四行诗。这种诗体是在鲁达基（波斯诗歌之父，850—941）之后经许多代人的共同努力才逐步定型的。因此，《福乐智慧》中的四行诗，就其未被作者冠以“柔巴依”的诗体名称而加以区别

这一点来看，认定它们是柔巴依早期的代表作品，是合乎逻辑的。这样，《福乐智慧》就为维吾尔族柔巴依传统的确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福乐智慧》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它不仅在喀拉汗朝受到极高的评价，使作者荣获“御前侍臣”的称号；而且，对当时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世的文学，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能够直接说明这一点的是《福乐智慧》正文之前所附的韵文体和散文体两个序言。内容相同的这两个序言都提到：“由于此书无比优美，无论传到哪位帝王手里，无论传到哪个国家，那儿的哲士和学者们都很赏识它，并为它取了不同的名字和称号。秦人称它为《帝王礼范》，马秦人称它为《治国南针》，东方人称它为《君王美饰》，伊朗人称它为《突厥语诸王书》，还有人称它为《喻帝箴言》，突朗人则称之为《福乐智慧》。”此外，还有一些史料和研究资料也间接地证明了上述情况。1900年国外刊布的十四世纪的一份波斯文献，曾提到一部包括民事法典在内的成吉思汗的箴言集，也被称为《福乐智慧》。刊布者梅里奥兰斯基认为，成吉思汗传下来的这本书正是十一世纪回鹘语《福乐智慧》的仿作^⑮。1909年，在位于乌拉尔河口地区的金帐汗国的故址萨莱伊乞克村发现的一个瓦罐上，刻有显然源出于《福乐智慧》一书的诗句^⑯。研究者们还认为，喀拉汗朝末代文学的代表作、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的维吾尔族古典诗人艾合麦提·尤格纳克所著回鹘语哲理长诗《真理的入门》，在内容、风格和语言上都接受了《福乐智慧》的深刻影响^⑰。十四世纪的维吾尔族古典诗人纳斯尔·拉布胡孜所著回鹘语作品《先知传》中的某些描述方法，也似乎是《福乐智慧》的影响所致。《福乐智慧》还被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体现了中亚毗邻地区（印度、波斯、埃及和其它阿拉伯人所在地区）所熟悉的“古风”，在成书五个世纪后，影响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西方竟相以类

似的形式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观念。欧洲人的《守法镜》，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君王宝鉴》，德国人的《亲王的箴言》和斯拉夫人的箴言集等，都同这种风格相近。在古斯拉夫人中则有《口才卓越者》，俄国人中有《雄辩的演说家》、《治家格言》等^⑧，也可归入这一类型。

至于说到《福乐智慧》开一代诗风之先河，形成了绵延至今的维吾尔族文学中劝喻、哲理诗传统，则更是毋庸置疑的。

(四)

《福乐智慧》的手稿迄今尚未发现。目前传世的三个抄本，都距原著写作年代十分久远。这三个抄本分别为：

维也纳本：又称赫拉特本，系一四三九年由哈桑·喀喇·沙依勒·谢米斯在赫拉特城用回鹘文抄成。一四七四年发现于伊斯坦布尔，抄本残缺不全。后被在该处供职的奥地利东方学家普尔戈什塔里送至维也纳，现存维也纳国立图书馆。一八二三年，法国学者卓别尔在《亚洲杂志》上首次发布了有关《福乐智慧》的报告，同时，刊布了作品的片断。一八七〇年，匈牙利学者万别里根据这一抄本，发表了作品中的915个双行诗的拉丁字母转写和德文译文。一八九〇年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影印了维也纳抄本；次年，他又用满文字母转写刊印了这一抄本。

开罗本：用阿拉伯文字母（苏鲁斯体）抄成，据估计抄就年代不晚于十四世纪上半期。一八九六年在埃及开罗发现，由德国人穆里蒂兹公布，现存开罗“凯地温”图书馆。一八九七年由拉德洛夫主持为彼得堡亚洲博物馆制成这一抄本的副本，同维也纳本做了对照，从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先后出版了《福乐智慧》的斯拉夫字母转写和德文译本。据研究，开罗本也是一

个残本，缺漏甚多，而且可能由多人合抄完成。拉德洛夫据此制成的副本，现存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

纳曼干本：又称费尔干纳本。用阿拉伯文字母（纳斯赫体）抄就。据研究，它是最完整和最古的抄本，约抄成于十二世纪末或十三世纪上半期。这一抄本于一九一三年由A·Z·维利多夫在费尔干纳地区纳曼干城的一家私人藏书室里发现。它曾一度失落，后由乌兹别克学者福蒂莱特寻获，于一九二五年在塔什干发布消息。一九二八年底，福氏在其专著中发表了作品的若干片断，并以乌兹别克文加以注释。这一抄本现藏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上述三种抄本所存诗行的数目、序言和目录的排列顺序等均不尽相同。如开罗本有五千四百个双行，费尔干纳本为六千零九十五个双行，维也纳本所存诗行数目最少。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土耳其先后出版了三个抄本的原文影印本。土耳其学者热西特·拉赫麦特·阿拉特对三个抄本进行了校勘，经过多年努力，于一九四七年出版了原书全文的拉丁字母标音转写本；一九五九年出版了土耳其语的散文体译本。阿拉特辞世后，由其门人代为完成并于一九七九年出版了《福乐智慧》的词汇索引。

阿拉特发表的校勘本共由正文和三个附篇六千六百四十五个双行（即一万三千二百九十行）以及两篇序言组成。正文分为八十五章。这个校勘本因较为完整而为国际学术界所普遍采纳，成为开展《福乐智慧》研究所依据的主要版本。

一九七一年，苏联塔什干出版了乌兹别克斯坦语言学家柯尤姆·凯里莫夫参照阿拉特校勘本翻译的乌兹别克文版的《福乐智慧》。然而，这个译本仍以纳曼干本为主要依据，正文只有七十三章。

一九七九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耿世民和魏莘

一同志根据阿拉特校勘本完成的汉文节译本。

一九八三年，苏联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С·Н·伊万诺夫根据阿拉特校勘本主持翻译的《福乐智慧》的俄文全译本。在此之前，苏联曾发表过Н·格列布涅夫、С·Е·马洛夫、А·А·瓦里托娃、Т·А·阿布都拉赫曼诺夫等人分别翻译的俄文选译本。从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三年，苏联学者还先后发表过《福乐智慧》部分章节的阿塞拜疆语和哈萨克语译文。

一九八三年，在美国芝加哥出版了罗伯特·丹柯夫翻译的英文版《福乐智慧》。

一九八四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集体完成的《福乐智慧》的拉丁字母标音转写和现代维吾尔语诗体今译合刊本。

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上述《福乐智慧》多种版本的问世，产生了大量研究著述。国际学术界对《福乐智慧》及其所反映的古代维吾尔社会、历史和文化，展开了不断的探讨，形成了被某些国外学者称之为“福乐智慧学”的专门研究领域。

《福乐智慧》的系统整理和出版，是我国对各少数民族古代文化遗产开展系统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总规划的一部分。为此，一九八〇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由哈密提·伊敏诺夫为首的编辑委员会。新疆社会科学院具体负责和完成这一工作。本书汉文版的翻译、注释，由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承担，并得到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支持。

本译本为《福乐智慧》一书的汉文全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拉丁字母标音转写本。在翻译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一并出版的维吾尔语诗体今译本和尚未刊行的维吾尔语散文体今译本。上述三者，均由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完成。

在斟酌个别词句的译法时，查对了土耳其学者R·R·阿拉特

的土耳其文散文体译本、苏联学者С·Н·伊万诺夫的俄文译本和К·凯里莫夫的乌兹别克文译本。诸本释义相异时，依据原文按汉译者的理解译定。

为便于译文同标音转写原文以及现代维吾尔语诗体今译文相查对，采取了R·R·阿拉特校勘本的诗行编号法，分别对诗体序言及正文，每一个双行（biyit）编一个号码。为便于查对长诗中的“四行诗”（即“柔巴依”，rub a'i），四行诗的第二个双行采用暗码，并用黑体排印，以示区别。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曾从阿不都秀库尔·图尔迪同志处获益匪浅。译文承蒙阿不杜热依木·吾铁库尔同志悉心校阅，经伊卜拉音·穆提义同志以及陈华同志披阅并提出宝贵意见。李琪、陈继周两同志参加了部分外文参考资料的翻译。买买提明·玉素甫和刘志霄两同志亦为本书的翻译付梓做了许多工作，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译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日

①关于公元九至十三世纪以今新疆喀什为中心的喀拉汗朝诸汗王究竟隶属哪个部族的问题，至今在国际学术界尚无定论，存在着十几种假说。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喀拉汗王朝是由葛逻禄人，更确切地说，是葛逻禄的两个分支——样磨和处月部建立的。有的观点则认为在喀拉汗朝的汗王中，回鹘人居多；而且，回鹘语言和文化在王朝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可参看〔俄〕B·B·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苏〕A·H·科诺诺夫：《优素甫·巴拉萨衮的长诗〈福乐智慧〉》（载俄文版《福乐智慧》，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苏〕哈萨克斯坦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维吾尔学部：《维吾尔文学简史》（阿拉木图，科学出版社，1983年）；〔土耳其〕R·R·阿拉特：《福乐智慧（校勘本）前言》

（安卡拉，1979年第二版）等。

据我国《旧唐书一百九十五回鹘传》记载，840年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灭亡后，有十五部回鹘人“西奔葛逻禄”，即到达以七河流域为中心的葛逻禄地区。他们的活动虽以后再未见之于史料，但似可推断已汇入葛逻禄部之中。由此看来，喀拉汗朝的主要成份应当是回鹘人、葛逻禄人、样磨人、土赫色人、处月人……等等。这一点可在与《福》书同时代的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中得到印证。

②巴拉萨衮，又称虎思斡耳朵，汉文史籍作“碎叶”，位于七河流域楚河河谷，现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玛克市以西、阿克皮心一带。

③“桃花石”（Tavṛlaq）一词在公元六世纪末即出现于东罗马史料。八世纪亦见之于古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指称“唐朝”。可参阅《新疆简史》（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册，第156页）和B·B·巴尔托里德：《文集》（莫斯科，1968年，第五卷，第87页）。十一世纪的《突厥语词典》对这个词有如下几种释义：指“马秦”；指突厥之一部；用于“汗”的称号，意为伟壮和古老。见《突厥语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维吾尔文版，1980年，第一卷）。桃花石·布格拉汗的全名为桃花石·布格拉喀拉汗·阿布·阿里·哈桑·宾·苏莱曼。在接受《福乐智慧》的时候，这位可汗任喀拉汗东部王朝的副可汗，尚未升为大汗。他作为大汗的在位时间是回历467—696年（公元1074—1102/1103年）。喀拉汗朝分裂后的这段历史，可参阅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另，在新疆莎车曾出土一件回鹘文书，上书有这位可汗的相当长的尊号：“伟大的天佑神助的无往不胜的君王、教圣、强国缔造者、伟大光辉民族的代表、纯洁信徒们的精英、穆斯林的拯救者、东方和秦的执政者、穆民们的圣贤和首领、被遴选为安拉的哈里发的可汗桃花石·布格拉喀拉汗·阿布·阿里·哈桑·伊宾·苏莱曼·阿尔斯兰喀拉可汗”。从这位可汗由“布格拉汗”（公駝汗）升为“阿尔斯兰汗”（狮子汗）可以看出，此时他已成为东部